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3.02.009

阿特伍德《羚羊与秧鸡》中的食物隐喻

蒋怡,蔡沂岑

(江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摘要:阿特伍德的《羚羊与秧鸡》延续了作家一贯以来对食物书写的深刻关注,通过刻画未来社会里食物丰腴与匮乏的不同场景,凸显了食物营造政治力场这一创作主旨。具体而言,小说将进食、喂食、同类相食等行为转化为文学隐喻,着力描述了食物与个人身体、家庭权力和社会生态之间的深层关联,食物不仅是权力阶层规训民众身体的媒介,还隐秘地参与到家庭和社会权力场的斗争中,折射出人性的欲望和西方文化如弱肉强食、过度消费与进食等内在痼疾,从而揭示了饮食与身体、象征性的进食和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

关键词:食物;阿特伍德;《羚羊与秧鸡》;政治;同类相食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3)02-0064-06

《羚羊与秧鸡》(*Oryx and Crake*, 2003)是加拿大著名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 1939—)的一部典型的后启示录小说(post-apocalyptic novels),刻画了人类文明没落后的凄凉场景,在科技已超出人类控制的未来社会里,人类无节制的攫夺与进食欲求造成了正常秩序的崩溃,社会被割裂为“大院”与“杂市”的对立体,身为权贵阶层的前者对后者展开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压榨,最终,席卷全球的生化灾难“红死病”收割了几乎所有人的性命。小说延续了阿特伍德一贯以来对食物书写的深刻关注,它一方面构想了一个食物丰腴的未来,各种被科技扭曲的动植物食品替代了人们以往熟悉的食物,这些被附加了大量人工信息的食品是异化的工业产品,折射出后工业生产体系的伦理困境;另一方面,故事里疫病过后的世界经历了食物匮乏,主人公“雪人”(在故事的回忆中叫吉米)是少数幸存的人类,如同

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意义上的“赤裸生命”(bare life),他终日思考的不过是原始的生存问题,也即食物和搏斗,与“仅仅是活着”、缺乏特定风格和生命意义的动物生命并无二致^①。

学界对阿特伍德早期小说中的食物书写有过丰富翔实的研究^②,但除去唐建南就“疯癫亚当”三部曲中的食物危机、慢食运动与素食主义的乌托邦饮食体系撰写过相关论文以外^③,对作家新世纪小说中的食物书写的关注并不多。本文认为,《羚羊与秧鸡》将食物和进食问题推至叙事的前景,凸显了在后人文主义视角下审视食物与食欲在不同场合营造的政治力场这一创作意旨。正如阿特伍德所言,政治就是“谁有权对谁做什么而不受惩罚,谁因此获利,谁因此摄入何种食物”^④,《羚羊与秧鸡》中的饮食就是一种明确的政治,它承载着人物的身体经验、欲望之争与权力博弈。本文从个人身体、家庭权力和社会生态这三

收稿日期:2022-11-12

作者简介:蒋怡(1985—),女,江苏无锡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英美文学研究。

①Agamben, Giorgio.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ford: Stanford UP, 1998, p. 1.

②譬如,帕克(Emma Parker)分析过阿特伍德早期小说中的饮食政治,她认为这些小说重新诠释了女人与食物的关系,为读者理解食物所表征的性别权力提供了文本范例;斯基茨(Sarah Sceats)指出阿特伍德将食物与(不)吃和性别与文化政治建立起直接的关联,并探讨小说中食物和饮食行为如何将加拿大城市生活中的性别角色加以问题化。详见 Emma Parker, “You Are What You Eat: The Politics of Eating in the Novels of Margaret Atwood”, in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41.3 (1995), pp. 349-368; Sarah Sceats, *Food, Consumption and the Body in Contemporary Women's Fi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0.

③唐建南:《论“疯癫亚当”三部曲中的食物生态书写》,《山东外语教学》2021年第6期。

④Atwood, Margaret, and Jo Brans. “Using What You're Given.” *Margaret Atwood: Conversations*. Ed. Earl G. Ingersoll. London: Virago, 1992, p. 149.

个层面着手,考察该小说中的食物隐喻,探讨被规训的身体状态、家庭中的进食较量和社会两极分化下的同类相食这三种与食物有着密切关联的现象及其内在的权力逻辑,以揭示饮食与身体、象征性的进食和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 基于食物的身体经验

饮食如阿特伍德所指出的,是“人类最古老的隐喻,它先于我们对性别差异、种族、国别和语言的意识,吃先于说”^①。就个体层面而言,食物是人们为延续生命而提出的最根本的诉求,它不仅关乎生存,“还与社会功能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②。因此,饮食习惯不仅根深蒂固地内在于一个民族、部落或社群,其背后还深深地刻上了心理、社会和政治的烙印。在《羚羊与秧鸡》中,进食的身体被刻画为权力交锋的前线,食物的生产印刻上了权力运作的逻辑,小说对食物、进食、食欲等的叙写展示了食物文化是如何被嵌入权力关系的网络中的,从而为读者理解人类与食物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

对于食物的描述贯穿于《羚羊与秧鸡》的全部叙事。一方面,食物不仅构成了小说人物身份认同的隐喻,还与他们的精神状态有着紧密的联系。进食行为看似寻常,实则指向身体边界的破裂,代表着对“自我的原始破坏”^③。人们让作为“他者”的食物进入体内进而被咀嚼、吞咽和消化,这既打破了自我的完整性,同时也表达着自我对外在他者的接纳。因此,进食具有重要的心理和文化意蕴。小说里生长于大院的吉米愿意吃人造食物奥那宾斯牌鸡肉球,而他来自杂市的大学室友和伯妮斯等人则无法容忍这种食物,食物选择的差异表明了两个阶层之间的身份鸿沟。阿特伍德故意凸显叙事中食物和进食的象征性而非生理学功能,将其与人物的状态深度绑定,成为他们生活的旁注。在幼年时的家中,吉米发现“照例没有午饭在等着他,他得自己做,他妈妈的参与仅仅是用平淡的语气发号施令”^④,这一场景暗示着

吉米与母亲不正常的亲子关系。成年后的他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他“在人群的边缘游荡,一边啃一只烤熟的豆制品热狗,一边暗暗地把视野中的每个人都撕开”^⑤,吉米身心的无力感经常以酗酒为标志,“宝贵的苏格兰威士忌”陪伴了他所有情绪崩溃的时光^⑥。

另一方面,能否控制自己何时吃、吃何种食物则是判定人们是否具有控制身体的权力的一杆标尺。英文谚语“你即为你所食”(You are what you eat)表面看来是在人与其食物之间画上等号,但它的深层意义则是掌控进食就拥有控制身体的权力。反过来说,当吃或不吃不再是人们自由择取的选项,人们也不再能左右和决定吃何种食物,也就是说,当食品生产和进食为某个阶层所操控时,那么食物就成了规训的工具,而进食若由他人决定,那么该身体则变成了福柯意义上的“驯顺的身体”。在小说中科技至上的后工业社会里,自然食物变得稀有,用“肉毒杆菌、沙门氏菌制成的营养饮食”则司空见惯^⑦,科学家们扭曲了动植物的天然生长规律,造出了噩梦般供人嚼咽的“动物身体”,没有头的“鸡肉球”两周就能端上人类的餐桌,由于其功能只需要产肉,所以它的脑器官也被剥夺了,类似的技术概念还有将绵羊和袋鼠杂交的“袋羊肉”、长了五六个肾的“器官猪”等等。当科技食品占据市场、构成人类吃食的主要来源时,人们应该警惕的是,所有这些技术型产品都是强权规训意识的产物,它们由被技术精英主导的大院研发,然后向杂市推广。食物原本能带来身体经验的传承与更新,但工业设计和流水线生产垄断了进食品质与渠道,它所开启的不仅是资源掠夺和财富积累,更是社会鸿沟无可挽回的加深。上市后的工业化量产食物通过咀嚼进入人体的过程,本质上啮合了大院所代表的上层资本市场对杂市里大众精神侵蚀的路径。大院一方变本加厉地进犯大众廉价的身体,依靠食物建立起“一种支配人体的技术,其目标不是增加人体的

①Atwood, Margaret. *The CanLit Foodbook: From Pen to Palate—A Collection of Tasty Literary Fare*. Toronto: Totem Books, 1987, p. 2.

②Sceats, Sarah. *Food, Consumption, and the Body in Contemporary Women's Fi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0, p. 1.

③Ellmann, Maud. *The Hunger Artists: Starving, Writing and Imprisonment*. London: Virago Press, 1993, p. 36.

④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羚羊与秧鸡》,韦清琦、袁霞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⑤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羚羊与秧鸡》,韦清琦、袁霞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59页。

⑥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羚羊与秧鸡》,韦清琦、袁霞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⑦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羚羊与秧鸡》,韦清琦、袁霞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99页。

机能,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建立一种关系……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①。食物垄断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微观权力关系,在社会中驯化出一批温顺的身体。

再进一步,小说中的食物既是权力规训身体的通道,也是参与身体形塑的能动者。身体将食物吞入,然后将其转化为能量,从而实现身体与食物的融合,或者说叫相互改变——身体因进食而获得饱腹感或提升能量,食物则从外在他者变为身体的一部分,致使身体的内外边界变得模糊。因此,身体既是渴望食物、追逐食物的主体,也是遭到食物形塑的受体。提出“活力物质论”(vibrant materiality)的贝内特(Jane Bennett)认为,进食就是“人类身体与非人类物体之间的相遇”,她相信,不止药物和咖啡因,“蔬菜、啤酒、浆果、鱼”等所有食物都拥有“某种强大的活力”^②,叫作物质能动性(material agency)。在小说中,情节的高潮部分是秧鸡设计制造的“喜福多”药片发挥了强大的能动性,根据其设计者的要求形塑服用者的身体,譬如提升或降低他们的性欲、保护他们抵御某些疾病等等^③。它不仅借多种功效的噱头操控人们的生理心理功能,还背地里植入“剧腐”病毒,这种病毒引发的红死病瘟疫导致了小说中人类作为一种物种的消亡。这一情节对整部小说至关重要,为回忆穿插的叙事手法奠定了基础。秧鸡设计出“喜福多”药片然后在全球各大城市推广,实施他毁灭人类、建立“秧鸡人”统领世界的计划,这一行为虽消解了固有的“大院一杂市”权力结构,却彰显了他意图实现乌托邦构想的权力欲望。因此,小说中的食物既是福柯所说的微观权力网络的载体,也是技术精英阶层显示其无限膨胀的个人欲望的武器。

二 家庭中母与子的进食较量

在家庭层面,食物是成员之间沟通的媒介。一般来说,母亲被认为是家庭组织中制定食谱并引导全家摄入能量的角色,她通过向家人提供食

物来表达责任和关爱,家人则以进食回馈主妇的善意并表达信任,从而建立起亲情的纽带。由于孩童无法完全拥有寻找食物和进食的能力,母亲与孩童之间的关系更是通过食物发生了深层的捆绑。但需要注意的是,家庭并不简单地是“人的心灵结构的铸造地”,它同时还是“权力领地、竞技场和实验室”^④。母亲喂养幼子的专属责任在一些学者看来是文化制度以天职为借口对女性实施的压迫,可同时,母亲也可以通过食物对进食的孩童施加控制和影响。换言之,母亲既是被控制者,亦是控制者。因此,喂食与进食中往往会折射出亲子关系的张力,使得食物化身为家庭权力争斗的一种隐秘语言。

在《羚羊与秧鸡》中,食物承载着母与子之间紧张的角力。吉米身为科学家的父母起初共同为大院效力,但他的母亲莎拉逐渐对周围膨胀堕落的科研风气产生不满而离开了大院,整个人变得越来越偏激愤慨,她将怨愤情绪发泄在儿子身上,不仅粗暴地对待他,而且在喂养方面表现出消极懈怠的态度,幼小无助的吉米在进食上遭遇了快速的心灵催熟。母亲对孩子的养育“依赖于重复定期的关爱和喂养,而不是偶然或临时起意的行为”^⑤,因此母亲所喂养的不是简单的食物,而是负载着“爱、憎恨、鼓励或恐惧”的食物^⑥。易言之,食物的生理功能不是唯一的,它还有附带的心理文化等象征性功能,从中我们可以窥探出亲子关系的真实本质。莎拉不甘沦为权势阶层谋利的工具,她的意识觉醒体现在她拒绝与人同流合污并因此放弃了工作,这也导致了她在社会中的权力被剥夺并被边缘化,她将愤懑和焦虑以拒绝提供食物、放弃养育幼儿的方式施加于年幼的吉米身上。这其中有两组权力模式在运作:大院对莎拉的奴役和莎拉对吉米的控制。斯基茨(Sarah Sceats)曾指出:“西方社会中的母亲角色哪怕不是自相矛盾,那也是模棱两可的;母亲既拥有着至高无上的强大力量,同时又因为她们养育、服务的

①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56页。

②Bennett, Jane.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 Durham: Duke UP, 2010, p. 47.

③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羚羊与秧鸡》,韦清琦、袁霞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05页。

④Bowie, Malcolm. *Lacan*. Cambridge: Harvard UP, 1991, p. 5.

⑤Sceats, Sarah. *Food, Consumption, and the Body in Contemporary Women's Fi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0, p. 11.

⑥Sceats S. *Food, Consumption, and the Body in Contemporary Women's Fi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0, p. 11.

角色而在社会中被剥夺了权力。”^①对于大院而言,莎拉是被奴隶和利用的对象,但对于吉米来说,莎拉则是强大的食物供应者。

面对母亲拒绝喂养的冷暴力,吉米以放弃进食作为抵抗,母与子之间形成了一个基于食物与进食的剑拔弩张的权力场。食物既可以是喂食者对孩童进行控制与驯化的工具,同时也意味着进食者可借助这一载体对抗支配。母亲莎拉的拒绝喂养,给幼年的吉米造成了不亚于拉康(Jacques Lacan)意义上的断奶情结(Weaning Complex)的痛苦。拉康认为,“断奶在人类心灵上留下了一种永恒的生物关系断裂的痕迹,这一生命危机事实上伴随着一个心理危机,那是人一生中第一个危机,其解决方法无疑有着辩证的结构”^②。莎拉的消极喂食对吉米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断奶之痛的复现。吉米渴望母爱,羡慕“小器官猪十二个一排,依偎在母猪身旁贪婪地吸吮着奶”^③,在意识到母亲放弃自己后,他用消极的态度抵抗在家里吃饭以逃避与她的交流,母亲的“断奶”惩戒对吉米而言是重大的创伤性事件。在这场各自经历创伤的母与子所展开的较量中,母亲放弃照顾孩子的母职,孩子则以在家拒绝进食来反抗,但与其说吉米是以饥饿的身体来抗议母亲对他身体的控制,不如说是他以自我毁灭式的断食表达对母亲的依恋。

小说中母与子围绕食物的对抗同时还具有模仿性和轮回性。年幼的吉米失去了温情的食物,被截断了对母爱的感知,女佣德洛丽丝的蛋糕则作为亲情的仿品给了他母亲般的温暖,将他引入带着蛋糕芬芳和母乳气息的理想世界:“他紧紧抓住那些蛋糕的真实性不放,蜡烛全点亮了,散发出沁人心脾的香草芬芳,就像德洛丽丝本人的香味。”^④即使多年后“雪人”回忆起家,浮现在心头的也只是替代母亲的女佣所做的蛋糕的味道。在

母亲缺席的情况下,德洛丽丝这位他非生理学意义上的母亲烹饪的替代品补足了他对母爱的渴望。成年后的吉米收到莎拉的死讯后,靠着疯狂进食来获得些许抚慰:“满地都是灰尘块儿、香烟头、脏玻璃杯以及鸡肉球空盒子,简直要及膝了。”^⑤无论是香烟、蛋糕还是酒,都为吉米创造了一种谵妄的状态,他借助进食抵抗挫折失意和转移焦虑,抵达暂时性的回归母体般的安宁。母亲莎拉也曾在恐惧和痛苦之时靠不断的抽烟来达到自我麻痹的效果:“我抽烟是因为我感到很沮丧,烟草公司让我沮丧,你让我沮丧,吉米让我沮丧。”^⑥对食物歇斯底里的吞咽,是吉米与母亲蛛丝般的亲情逝去后悲怆情绪的表达。从年幼的拒食到母亲离去后的暴食,吉米所展现的不仅是母亲缺位后的生理偏执行为,亦是需要矫正和疗愈的心理痼疾,他的暴食与莎拉当年的抽烟形象相互重叠,母与子隔着错位的时空,以相似行为的重复维系着亲情的纽带。

三 社会权力场中的同类相食

阿特伍德曾提到,不管是文化还是个人,都倾向于把“可食用的物分成五花八门的类别”,其中食用人肉对大多数人而言是“禁忌中的禁忌”^⑦。她坦言,同类相食或曰食人现象(cannibalism)让她着迷^⑧,她曾在多部虚构作品中描摹人吃人的残酷现实。《羚羊与秧鸡》表明,食人现象并非专属于遥远野蛮的原始部落,也不仅仅在社会秩序面临崩溃时才发生,它是权力关系不对等的必然结果,存在于任何时代或文明或野蛮的社会中,当然也包括故事里科技发达的未来。小说中的食人现象透露出阿特伍德对竞相盘剥与斗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西方文化模式的深刻理解,是作家剖析“人在社会上生存要么被他人食用要么成为

^①Sceats, Sarah. *Food, Consumption, and the Body in Contemporary Women's Fi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0, p. 11.

^②Lacan, Jacques. *Les complexes familiaux dans la formation de l'individu. Essai d'analyse d'une fonction en psychologie*. Paris: Navarin, 1984, p. 27.

^③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羚羊与秧鸡》,韦清琦、袁霞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

^④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羚羊与秧鸡》,韦清琦、袁霞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

^⑤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羚羊与秧鸡》,韦清琦、袁霞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96页。

^⑥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羚羊与秧鸡》,韦清琦、袁霞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60页。

^⑦Atwood, Margaret. *The CanLit Foodbook: From Pen to Palate—A Collection of Tasty Literary Fare*. Toronto: Totem Books, 1987, p. 2.

^⑧Goldman, Marlene. “Margaret Atwood's Wilderness Tips: Apocalyptic Cannibal Fiction.” *Eating Their Words: Cannibalism and the Boundaries of Cultural Identity*. Ed. Kristen Guest. New York: State U of New York P, 2001, p. 168.

猎食者这一困境”^①的文学修辞。

文学中的食人现象如斯基茨所指出的,主要以两种形式出现:“一是字面意义上的人吃人现象,二是将食人的欲望或行为当作隐喻来使用。”^②阿特伍德在与《羚羊与秧鸡》有着类似主题和关联情节的小说《洪水之年》(*The Year of the Flood*, 2009)中描述过一家杂市人经常光顾的“秘密汉堡”快餐店,这些汉堡的肉馅有时会用社会闲散人员或是前去检查食品卫生的监督员的人肉做成,是利益至上、道德泯灭的社会现实的一个缩影。《羚羊与秧鸡》虽未如此露骨地直接描摹食用人肉,但是读者在“器官猪”这一情节要素上发现了一种更为暧昧与复杂的同类相食现象——反身性食人(auto-cannibalism),也即食用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器官猪”的设计原理是将部分人类基因植入宿主猪的身上,“培植各种安全可靠的人体组织器官”^③,它们会长五六个肾,供人们采摘下来进行器官移植。“器官猪”虽有别于人类,但也并非绝对的异类或他者,而是处于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所讲的“既是我又不是我”的卑贱状态(abjection),挑战着人类主体与外在之间的稳定界线。当全球生态恶化导致肉类供应出现紧缺,“器官猪肉馅饼”“器官猪肉爆米花”等出现在人类的餐桌上时,人们食用的不仅是技术态食物,更是原本可能会移植到自己身上的器官,这种反身性食人的病态现象讽刺了西方社会在技术引导下的不受约束的消费及进食欲望。在疫病过后的荒凉世界中,“雪人”遭到了“器官猪”的围追堵截,担心着自己被后者吃掉,与雪人的脑袋“相连的是一块等着被享用的美味肉馅饼”^④。“器官猪”犹如弗兰肯斯坦造出的科学怪物一般追捕着“雪人”,这一情节指向失控的技术及其对人类的反噬。

小说中象征性的同类相食则表现在大院人与杂市人的互食之上,阿特伍德用隐喻化的语言表

征了弱肉强食的社会权力场中人们要么吃人要么被吃的现实。大院人拥有凌驾于杂市人之上的各种特权,他们用一系列言过其实的科技产品如欣肤乐、冷冻延寿舱等来蒙蔽杂市人,用各种空头承诺刺激他们的消费欲望以刮取民脂民膏,使他们完全沦为被控制者。如果说字面意义上的食人是寻找人肉来食用,那么“这种对人肉的渴望被推广普及到社会中时”,往往会演变为“将消费/进食当作美德来对待,将它视为快乐和兴奋的源泉,而过度地、任意地消费/进食则变为了最具有吸引力的权力”^⑤。同类相食的残酷行为被投射到对消费欲望的刺激上,暗示着消费社会与食人行为的同源性。另外,小说还用食人的隐喻说明,杂市人也以自己的方式使得大院人成为可被吞噬的对象。大院人对杂市里的细菌没有免疫力,如果去杂市,就好比是“俎上肉”,“像是在前额上贴了个醒目的标识,写着‘来吃我’”^⑥。吉米感觉杂市让他无所适从,“如果身处杂市,他将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不知道该如何行事才算对路子……他就跟饲料一样”^⑦。两个圈层的相互隔绝和等级现实,具体表现在上对下的全盘剥削和下对上的游击式反抗上,现实社会的食人现象不是单向的一方对另一方的吞食,它往往会演变成双向的对峙与互搏。

另外,食人的隐喻还渗透到叙事的细枝末节中,小说中既有对人与餐盘中食物的类比,也不乏有关食物获得人的灵性的譬喻。在孤身一人生活在疫病过后的世界上时,“雪人”有一天做了个噩梦,他的面前放着“一片圆面包——扁平的抹了花生酱的脑袋,亮闪闪的果冻笑脸,葡萄干做的牙齿”^⑧。梦中类似于圣餐仪式(Eucharist)的一幕情景契合了叙事的末世论语境,如弗莱(Northrop Frye)所言,在末日来临的世界上,人们往往“食用同类的肉,将小孩或爱人当作食物”^⑨。西方宗教中的重要仪式与人类社会最为凶残的食

①Sceats, Sarah. *Food, Consumption, and the Body in Contemporary Women's Fi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0, p. 99.

②Sceats, Sarah. *Food, Consumption, and the Body in Contemporary Women's Fi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0, p. 34.

③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羚羊与秧鸡》,韦清琦、袁霞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④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羚羊与秧鸡》,韦清琦、袁霞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页。

⑤Root, Deborah. *Cannibal Culture: Art, Appropriation,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Difference*.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 9.

⑥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羚羊与秧鸡》,韦清琦、袁霞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97页。

⑦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羚羊与秧鸡》,韦清琦、袁霞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页。

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羚羊与秧鸡》,韦清琦、袁霞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75页。

⑨Frye, Northrop. *The Secular Scripture: A Study of the Structure of Romance*. Cambridge: Harvard UP, 1976, p. 118.

人现象出现了耦合,在阿特伍德的笔下并不是如基尔戈(Maggie Kilgour)所强调的“自我与他者融合”的修辞^①,而是以戏仿的形式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西方文明的基础。或许在作家看来,西方社会的根本性堕落离不开宗教的强有力背书,为此,阿特伍德还在小说里设想了一个解决此种症结的方案:以食草替代食肉。吉米在饮食方面无法吃有脑袋的动物的肉,“他能看见动物们透过燃烧着的眼睛责备地看着他”^②;小说人物通过技术定制婴儿时,偏爱“漂亮、聪明、只吃草的宝宝”^③;而秧鸡设计的用来替代人类的秧鸡人也是只吃草的草食性生物。这一乌托邦设想试图超越弱肉强食的铁律控制下的现实文明,既表明作家对萦绕在西方文化之上的焦虑感的清醒认识,也寄托着她对非人类的动物生命的伦理关怀。

结语

食物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根本,其生产、制

作和消费已发展出一套自成系统的群体契约,深深地打上了特定文化的烙印。参与进食仪式的人们建构起一套相关的规范,“自我与他者、爱与攻击欲望”^④借由食物在不同层面相遇并展开角逐。在《羚羊与秧鸡》中,阿特伍德描述了食物与身体经验、家庭权力和生态之间的深层关联,呈现了科技高度发达的未来社会里多种形态的进食画面所包含的权力逻辑。她笔下有关食物的叙事比如进食、食欲、喂食、同类相食等行为,既是对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也构成了一系列象征和隐喻,被糅入作家对人类政治生态的考察中。透过食物的视角,小说将作为纯粹物质和象征符号的身体交织在一起,剖解了人性欲望、社会文化和权力规则的运作:食物不仅被权势阶层当作规训身体和彰显个人权力的媒介,它还秘密地参与到家庭与社会权力场的斗争中,折射出人性中潜藏的欲望与西方文化如弱肉强食、过度进食与消费等内在的种种痼疾。

Food Metaphors in Margaret Atwood's *Oryx and Crake*

JIANG Yi & CAI Yi-ce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Margaret Atwood's novel *Oryx and Crake* embodies her longtime profound interest in writing about food. Through depicting different scenarios in the future society where food is either abundant or scarce, this novel puts the theme of food politics in the foreground. Specifically, Atwood uses eating, feeding, appetite and cannibalism as literary tropes to explore the deep-rooted connection between food and individual bodies, domestic and social power. Food is the weapon that the powerful has to discipline the masses, and it also secretly participates in the fierce fight of domestic and social force-fields, which reveals the desire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innate illness of the western culture such as the jungle law of “eat or be eaten” and excessive, willful consumption.

Key words: food; Margaret Atwood; *Oryx and Crake*; politics; cannibalism

(责任校对 葛丽萍)

①Kilgour, Maggie. *From Communion to Cannibalism: An Anatomy of Metaphors of Incorpor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90, p. 4.

②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羚羊与秧鸡》,韦清琦、袁霞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③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羚羊与秧鸡》,韦清琦、袁霞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17页。

④Kilgour, Maggie. “Foreword.” *Eating Their Words: Cannibalism and the Boundaries of Cultural Identity*. Ed. Kristen Guest. New York: State U of New York P, 2001, p. viii.